

蒋方
■
著

汉月边关万古情

昭君与昭君文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本书的出版得到湖北昭君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资助

汉月边关万古情

——昭君与昭君文化

蒋方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月边关万古情：昭君与昭君文化 / 蒋方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077-8

I. ①汉… II. ①蒋… III. ①王昭君（前55~?）—
人物研究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9664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月边关万古情：昭君与昭君文化

蒋方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077-8

2015年3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3/4 彩插 8

定价：40.00 元

目 录



前 言 / 1

史 实 篇

第一章 昭君生养的小山村 / 14

- 一、王昭君的名与字以及官称 / 14
- 二、王昭君怎样进入汉朝宫廷 / 17
- 三、“昭君”村名的由来 / 19
- 四、今天的昭君村 / 20
- 五、昭君进京的杜撰之说 / 25

第二章 从兴山到长安 / 30

- 一、南郡·秭归·兴山 / 30
- 二、昭君村与兴山 / 32
- 三、秦楚大道的开拓与发展 / 34



四、汉代的驿传制度 / 40

五、从兴山到长安 / 43

第三章 汉元帝刘奭的胜利 / 48

一、高祖刘邦与匈奴的和亲 / 49

二、武帝刘彻与匈奴的战争 / 53

三、宣帝刘询的政策调整 / 58

四、元帝刘奭的胜利 / 61

第四章 匈奴呼韩邪单于的胜利 / 65

一、冒顿单于与匈奴的崛起 / 66

二、单于庭的北迁 / 70

三、单于们的混战厮杀 / 76

四、呼韩邪单于的胜利 / 79

第五章 昭君请嫁 / 83

一、赐婚说 / 85

二、请嫁说 / 90

三、昭君请嫁之评说 / 96

第六章 出塞和亲 / 102

一、启程时间 / 102

二、两条路线说 / 105

三、琵琶、胡笳、《昭君怨》 / 108

第七章 宁胡阏氏 / 114

一、单于阏氏的地位 / 115

二、宁胡阏氏 / 118

第八章 昭君的后人后事 / 124

一、化干戈为玉帛 / 126

二、须卜当夫妇的不归路 / 131

传说篇

第一章 人物传说的演绎 / 145

一、毛延寿及其内蕴的扩展 / 148

二、呼韩邪、汉元帝的爱情演绎 / 167

三、王昭君的形象演变 / 173

第二章 地名传说的存留 / 182

一、青冢 / 183

二、蹄窟岭 / 193

三、香溪 / 200



影响篇

第一章 美女昭君 / 213

- 一、“四大美女”之说 / 213
- 二、两种“四美”的组合 / 217
- 三、超越时空的美女昭君 / 227

第二章 怨女昭君 / 232

- 一、心结千千 / 234
- 二、别有块垒 / 239

第三章 忠贞昭君 / 247

- 一、堂堂忠义 / 249
- 二、佳人失节 / 253
- 三、巍巍青冢 / 257

第四章 使者昭君 / 264

- 一、和亲与联姻 / 265
- 二、牺牲与功臣 / 271

前 言



王昭君是著名的历史人物，更是中国文学传播接受史上的著名人物，由此构成了一种文化的现象。

中国素有尊重历史的文化传统，历代王朝莫不重视史书的修撰，以资助政治，裨益教化。故而对于史家来说，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人物言行，凡是进入正史的记载，一要真实，二要详备。王昭君之所以载入史册，是因为她是汉朝送与匈奴的和亲女子，与需要真实记录的国家大事有关，至于她本人，则是轻微屑小而不足道者，故其言行事迹，史家或是忽略不记，或是语焉不详。但是，这位在史书中只是一笔带过的女子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所受到的关注之深广久远，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之丰富厚重，超过了许多在正史中立有传记而叙事翔实的帝王将相、贤臣名士和英俊淑媛。这是因为，王昭君不仅仅是一位汉代女子，王昭君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持续不衰的受到热情关注的重要题材。

早在西汉末年，距昭君出塞和亲这一政治事件发生不过才十数年的时间，社会上就流传着关于王昭君的民间歌谣。当时学者焦循作《焦氏易林》，



就在书中采用了一些有关昭君的歌谣。当这类歌谣被采录进入朝廷的音乐机关——乐府进行演唱后，更引起了生活在社会上层的文人的兴趣，通过他们的模仿创作而形成了两个著名的乐府诗题：《王昭君》和《昭君怨》。这两个乐府诗题经魏晋历唐宋而入明清，始终受到文人的关注，或是依题创作，或是由此而生发新题，二千余年中，从未间断。这其中，不仅有个人的抒情写作，也有文人集会时的共同题咏。长期而又众多的创作者的参与，使题咏昭君的诗作数量蔚然可观。早在南宋时期，就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开始汇集历代有关王昭君的诗作。如南宋陈民瞻曾收集昭君事迹与古今歌咏编纂成书，付梓刻印，并请当时著名文人吕午为之作序（见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十八引宋吕午《王昭君辞序》）。可惜此书已散佚殆尽，不能知其面貌。现在可见的有清人胡凤丹所编纂的《青冢志》，汇集历代题咏昭君诗词及相关记载。据其目录所言，诸种资料之外，收诗已达五百零五首之多。而今人搜罗汇编的《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可永雪、余国钦编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收诗八百六十四首，收词二十六首，收曲三十一首，总计九百二十一首。应该说，这并非全数，遗漏者还有不少。而诗词之外，在宋元以后兴盛发展的戏曲、说唱、小说等文学体裁中，“昭君出塞”也是一个重要的题材，唯惜搜罗不周，尚难以计数。

同为和亲政治中的著名女性，无论是汉代的乌孙公主刘细君，还是唐代的文成公主，她们的遭遇同样引起民众的同情，唤起文人的感慨，同样也是古人著文议论或诗词题咏的对象，但是，无论是题咏的数量还是关切的深度，都无法与王昭君相比。

王昭君与西施、貂蝉、杨玉环并称为古代的四大美女。四位女子的传说故事在民众中传播，她们本人又是文人诗词题咏的对象，更成为了古代文人绘画中的常见题材。自唐代以来，许多著名的画家，如阎立本、李伯时、仇英等，都曾画过昭君图，传世者已经成为国宝级的文物。虽然在四大美女的

绘画中，未必一定是画昭君者居多，但是文人往往因画而诗，又因诗而画，以昭君为题的题画诗的数量，则在四大美女之中居于首位。

就现今保存下来的文献看，西晋名士石崇的诗《王明君》无疑是最早的题咏昭君之作，此后相沿。历代的名家大诗人，如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金代的耶律楚材、元好问，明代的何景明、李攀龙，清代的沈德潜、袁枚等等，均有题咏昭君之诗。而在历代题咏昭君的作者中，除大量的文人士大夫之外，还有帝王、僧侣，还有不少的女性。

由此可知，以昭君为题的文学创作，不仅数量多，涉及到的文学体裁多，参与创作的人数多，覆盖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虽然他们的地位不同，职业不同，但对昭君却有着共同的关注。显然，在古代社会里，“昭君出塞”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而在长达二千余年的时间里，无论历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话题的吸引力始终存在。无论是身处社会底层的百姓，还是自诩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这个话题总能激发人们的兴趣，引发人们的思考。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考察昭君题材的文学创作流布，可以看到始终存在着两条分道并行而有所交流的传播与接受的路线，一者是在民间百姓之中，一者是在上层文人之中。

王昭君的出塞和亲，是汉匈边境数十年间和平安宁的象征。东汉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就此而发议论说：“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关于昭君的歌唱最早起源于民间，如言“昭君守国，诸夏蒙德”，“交和结好，昭君是福”（《焦氏易林》卷十二），洋溢着赞美的热情。曾经长期遭受战乱之苦的百姓珍惜和平，感念昭君，用歌谣唱出了他们朴实而真诚的心声。尤其是，王昭君不是什么皇家贵胄，而是一位来自民间的女子，她之所去，则是长期以剽悍善于骑射而著称的匈奴，是困扰汉地边民使其心存畏惧的匈奴，是居住在遥远的荒烟大漠并难以测知其生活情景的匈奴，而她竟然成了单于的妻子；这里就包蕴了许多的可能性



而激起人们的好奇与想像。正是这种源于民间的感情推动了昭君出塞的文学创作，从简单的谣讴而发展出有人物有情节的传说故事，从表达心情的歌曲发展为以娱乐教化为主的说唱与表演。“昭君出塞”在中国民间一直拥有大量的听众和观众，人们的接受热情带动了传说故事的传播与增色。

早期的民间传播接受的主要形式是口耳相传的讲述，如果没有文字的记载，口耳相传的传说故事就有可能湮没在时间长河的淘洗之中。而当魏晋时期的文人对传说故事发生兴趣而开始搜集记录它们时，昭君传说就以文字书写的小说形式而进入了文人的视野，与经由乐府而传播的《昭君怨》等乐曲发生了交集，简单的同情开始转向人生命运的思考，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题咏诗开始成为文人表达感情的主要形式，并为后世文人所承继发扬，这就有了上面说到的数目可观的以昭君为题材的诗词题咏之作。进入唐宋时期，汉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治交往频繁而复杂；其后的元代与清代，又是少数民族执掌中央政权的王朝；这些因素都曾激发过文人的民族感情，不仅使他们保持了题咏昭君的兴趣与热情，也扩展了他们思考“昭君出塞”这一题材的角度与深度。这应该是文人题咏昭君的兴趣与热情在历史上不仅始终不衰而且呈现上升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早期的文学形式以诗歌为主，从而奠定了诗歌这一文学体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用闻一多的话说，叫做“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文学的发展动向》）。不过，这是根据有文字记载的文献而做出的考察，并没有将因为没有得到及时记载而失传的民间文学包括在内。而今天的人们之所以还能察知一些古代民间文学的情况，正是拜托于文字的记载，拜托于古代文人或偶然或自觉的关注。因此对于民间的文学，文人关注与文字记载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

民间文学深深地植根于民众的生活，“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现实

生活的具体生动使民间的文学充满新鲜活泼的内容，现实生活的复杂变化也赋予了民间文学无限的创造力。鲁迅曾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鲁迅书信集·致姚克》）这种尖刻的批评道出了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进程，也道出了文人通过采集记录活动在保存民间文学的同时，向民间文学学习的一种历史现象。因此，在中国，诗文的发展之早与小说戏曲的后起迟缓都是不争的事实；而文人文学总是通过向民间文学汲取营养而获得新的发展，这二者都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特点。以此来考察作为文学题材的“昭君出塞”，不仅可以印证这样的发展趋势与特点，而且还有超越之处，从而使“昭君出塞”在中国文学的传播接受史上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首先，“昭君出塞”作为一种文学题材所受到的关注普遍而广泛，但是就现存文献来看，文人的题咏诗词不仅数量多，更因为其中名士大家多而影响大，形式与内涵都不断有新的开拓，成就卓著。民间的歌谣和传说故事出现的时间早，却限于记录，只是文人诗词题咏所参考的素材，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新的表现。唐代以后，说唱艺术渐渐兴起，昭君出塞在民间的流传情况得到记录，今天的我们才能略窥一二。比如敦煌遗书中有六件文献以王昭君为题，包括《王昭君变文》、《王昭君怨诸词人联句》、《昭君怨》和三件同题为《王昭君安雅词》的文献（高国藩：《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研究》，《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2期）。其中，《昭君变文》是基于佛教的讲经宣教形式，但是有唐人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为佐证而可以知道，唐代民间讲唱昭君出塞故事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不仅走出寺院而进入了都市，不仅在西行的敦煌路上出现了文字纪录稿，其表演也为西南腹地的成都民众所喜闻乐见，于是才有吉师老的现场观感之作。但是，与数量庞大的诗歌相比，这时的变文说唱毕竟还是小巫。因此，虽然“昭君出塞”之成为文学题材的最早创作者本在民间，但从汉末以至唐宋，文人诗歌却是这一文学题材的最为丰盛的创作成果。



其次，宋代以后，小说戏曲的发展呈渐兴之势。当时一些在科举中落魄而沦落下层文人出于谋生的需要而加入了小说戏曲的创作队伍，这就大大地促进了中国戏曲小说的兴盛，本来就为民众所熟悉的“昭君出塞”遂进入了小说戏曲的创作领域。尤其是元明清三代，“昭君出塞”成为戏曲表演的重要题材。元代戏曲家关汉卿写过《哭昭君》，吴昌龄写过《走昭君》，遗憾的是存留到今天的只有马致远的《汉宫秋》。明代有过陈与郊《昭君出塞》、陈宇鼎《宁胡记》、吴孝思《昭君归汉》、佚名作者的《青冢记》等，可惜保存完整的只有同样是佚名作者的《和戎记》。清代以后更盛，如尤侗《吊琵琶》、薛旦《昭君梦》等，都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此基础之上，小说创作也迅速跟进，著名者如明代冯梦龙的《昭君》，清代署名雪樵主人的《双凤奇缘》等。这些主要是在民众中传播的戏曲小说，与同时处于创作热潮而数量庞大的文人题咏诗词一起，在元明清时期构成了昭君题材在文学传播接受史上的高潮。就昭君题材的传播与接受而言，相比于持续不衰的文人诗词，戏曲小说出现的时间虽然晚，却大大地改变了“昭君出塞”的题材面貌，情节变得曲折，人物关系变得复杂，人物形象也变得丰满起来。

第三，在昭君题材的文学传播与接受中，民间的传说故事为文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鲜的材料，丰富了文人题咏诗词的内涵，如毛延寿这一人物的出现。魏晋以来记载的传说故事中，画工索贿是一重要的线索，它使昭君出塞的文人题咏从单纯的同情而走向了历史的思考和现实的批判，将善恶、忠奸一类的道德命题与怀才不遇的士人悲怨结合到一起，特别能够打动那些在专制社会中坚持理想追求的古代文人。他们爱读《昭君怨》，是因为心灵易被触动；他们爱写《昭君怨》，是因为感情受到激发。毛延寿的出现，开拓了文人题咏感怀的场域，开掘了文人题咏感怀的深度，它是“昭君出塞”成为说不完、道不尽的文学题材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情不止于此。在最初的传说中，毛延寿只是可能索贿的画工之一，丑

化昭君肖像者并不能确定就是毛延寿。但是，经过文人题咏诗词一遍又一遍的不断重复，在中国民众的眼里，毛延寿成为了千古历史罪人，人们认定就是他造成了王昭君的悲剧命运。因此，在“昭君出塞”这一文学题材的传播与接受史上，不仅是文人创作从民间文学中汲取着营养，而且文人作品也在民间文学的创作中发生影响，有所反馈，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上下流动的交互影响。

这样的从文人诗词而进入民间戏曲的文学因素，并不止于毛延寿一例。比如，储光羲诗中所描写的温情体贴的单于与《昭君变文》中情义深挚的单于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学界通常认为《昭君变文》是中唐近于晚唐时期的作品，储光羲则生活在盛唐时代，在时间上至少要早几十年。在唐代，文人诗歌也常常通过演唱而在民间传播，从而在社会下层产生广泛的影响。如王维的诗《送元二使安西》就是通过民间艺人的传播而成为了中国古曲中的演唱名作《阳关三叠》。而从诗史上所流传的王昌龄、高适等人旗亭赌诗的佳话中，既可以看到民间艺人借文人诗歌而提升文化素质，又可以看到文人作者通过民间演唱树立声名，二者之间的交会则是以文人创作为基础。虽然没有实证材料，但是根据唐代民间艺人常常演唱文人诗歌的情况，根据储光羲的《明妃曲》与《昭君变文》之间的时间差距，让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想，《昭君变文》中的单于有可能是受到了储光羲诗中描写影响的再创造。比如，最早在唐诗中出现的青冢只是民间传说中的昭君坟，与昭君的死亡方式并无联系。在经过文人的反复题咏之后，青冢成为真实的地名而被载入史册，成为了人们凭吊的历史遗迹，更与昭君的品格联系到一起，从思乡之情而提升到忠君爱国、贞节不屈的道德高度，成了昭君的自杀和掩埋之地。这样的意义提升就抹去了昭君曾嫁两单于的事实，将历史的昭君变成了文学的昭君。于是，本来在唐人记载中位于黄河北岸的青冢，在元代以后的戏曲小说中，位置就移到了黄河南岸，因为黄河之北是“番国地界”，一旦渡河，就有损昭君的忠



贞形象。因此，青冢必须南岸，表示昭君至死也是身在汉境而不曾踏上外番的土地。从唐诗宋词到明清戏曲小说，青冢从传说的位置不定到言之凿凿的黄河南岸，这同样是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交流互动的一个典型事例。

昭君题材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的互动交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所保存并且可以考察的一个比较罕见的事例。而这一点，也正是昭君题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之所在。在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一些不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倾力抒写的文学主题，诸如“恋亲”、“思乡”、“悲秋”、“弃逐”等等。因为这些文学主题凝聚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价值观念，可以超越时空而长久地存在。而“昭君出塞”则是以一人之身而绾结起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共同关注。在这里，汇聚了不同方面的主题，汇聚起各等各色的人物，更使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所代表的两个社会阶层在文化与情感的价值取向上有所互动交流。这样一种高度凝注的文学题材，在中国文学史上，除了王昭君，似乎还找不出第二人。

王昭君本来只是因为和亲而被载入史册的一位女子，由于人们对她保持了长期的热情关注，因她而创作了数量可观又内涵丰富的文学作品，记录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地位包括不同民族的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内心感情，既在传承中有异见，又在新见中有传承。因此，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的昭君出塞和亲，就像一个小小的雪核，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被人们推拥着向前滚动，或快或慢，从未停止，或左或右，从未消失，于是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雪团而包蕴了复杂的意蕴。这里有文学，有历史，有政治，有外交，有个人的命运，有国家的安危；这里有诗歌，有词曲，有小说，有戏剧，有名士大家的抒情议论，有无名人氏的润色加工；这里有高尚与卑劣的品格褒贬，有贤良与忠奸的善恶斗争，有怀才不遇的人生遭逢，有舍身报国的赤胆忠心，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有宁死不屈的坚贞，有恶有恶报的后果，有善有善报的结局。自汉末魏晋以来，这些因昭君而感动的人们，既是读者，

又是作者，或留名，或佚名，都以各种方式而将自己对于社会、对于生活、对于现实、对于历史的种种认识和种种思考揉进了“昭君出塞”的话题之中。这样，“昭君”二字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名而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载体。人们在历史的昭君之外，又塑造了一位文学的昭君，也成就了一位文化的昭君。

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文学与历史的交织融会既构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的昭君，却也让人们往往不能分清，哪一位是历史上的昭君？哪一位是文学上的昭君？尤其是当一些作者为了申明观点，往往不顾史实，取传说为论证，以爱憎作判断，如明代陆次云的《明妃辩》，如清人昇寅的《汉明妃冢》，这就难免产生一些误导读者的结论。虽然说“诗无达诂”，文学阐释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来是正常而且值得提倡的态度与氛围。但是，文学就是文学，史学就是史学，学科性质不同，两者界限不可混淆。否则，历史失去了真实，文学也失去了想像。近些年来的昭君文化研究，因为与旅游文化的开发建设相关，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夸张其事，神化其人，热情有余而少了实事求是的精神，重视成果而少了认真探究的耐心，使得昭君研究中在古人那里就已经存在的文学与历史相混淆的现象变得更明显，更严重，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和忧虑。

本书的写作以昭君文化研究为研究对象，考察昭君主题的文学传播接受的历史过程，讨论其中呈现的问题及其文化意义，时间起止则限于古代。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史实篇从史实出发，在可能的条件下，理清昭君出塞的相关史事以及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历史问题；传说篇考察民间的传说故事及其发展，以见其特色与演变；影响篇清理历代文人的题咏诗词，从接受角度、阐释类型与意蕴开掘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以见其文化内涵。本书的写作宗旨是理清线索，划分界限，说明问题，因此也涉及到一些史料的考证。为了不影响阅读的完整感觉，故将这一类文字以延伸阅读的形式放在篇尾，以供读者选择是否作进一步的阅读。本书的写作力求深入浅出，既要保证严谨的学术性，言而



有据，也希望做到表达流畅，雅俗共赏。做到与否，则有待读者的批评。

笔者一直关注昭君与昭君文化的研究，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将多年的研读心得写作出版，非常感谢兴发集团总经理易行国先生的提议与大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圣元先生古道热肠，代为联系出版事宜，令我感动而要特别致谢。在写作过程中，早已毕业工作的学生刘睿、陈鑫、王阳、李小雨、方敏及刘赛都不吝时间和精力为我提供了许多事务及资料的帮助，兴山画家宁平先生也于百忙中帮助本书拣选图片，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蒋 方

2014年9月5日写定